

※ 學術會議 ※

「世界中的中國明末清初」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報導

商海鋒*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於二〇一五年展開以「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為題的三年計畫，繼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於文哲所主辦「戰爭與修辭」論壇之後，文哲所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於五月三十日與三十一日在東京大學伊藤國際會議中心，共同主辦「世界の中國明末清初」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參與會議的十位學者分別來自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和政治大學，以及日本的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本次會議開幕式由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高見澤磨教授、文哲所副所長廖肇亨教授致辭，兩位教授介紹本次會議的緣起，並指出會議探討的課題涉及明清之際中國學術的思想、文學、藝術和語言四大面向。明末清初是中國不同時期易代之際文化生產最豐富的時代，清末民初的諸多活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近代化進程，都十分看重明清之際的歷史詮釋。更重要的是，在十七世紀的明末清初，不僅東亞各國交往十分活絡，並且東亞與歐洲各國之間也有直接的聯繫，此時的東亞真正步入了「國際化」的時代。在簡單的開幕式之後，各分場展開熱烈討論。

第一場

主持人：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本報導由當時在東京大學實際參與會議的商海鋒博士撰寫，計畫主持人本所研究員廖肇亨先生負責修訂。

* 商海鋒，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發表人：

1. 嚴志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朝鮮文士筆下之錢謙益〉

2. 大木 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馮夢龍《三言》中的世界〉

第一場首位發表者為嚴志雄教授。嚴教授指出，錢謙益身兼明清兩代的高官，乾隆稱他為貳臣，然而對於朝鮮使臣南九萬(1629-1711)而言，朝鮮從高麗時代一變而為朝鮮時代，「易鼎」也成為他們的關鍵詞。故而南氏寫成《甲子燕行雜錄》，以秦喻清，與明清之際的詩學關鍵詞是相同的。該錄最重要的是提及了錢謙益的兩首詩。細讀錢氏的這兩首詩，詩史互證，《春秋》筆法寓於其中，寄託了深沉的褒貶之意。此外，錢謙益詩集中的「歌」字韻，值得單獨整理，常有深意，如〈和徐禎起〉、〈簡侯研德並示記原〉等皆是。十七世紀南九萬的見識不凡，對於錢氏此類詩歌之深意極有闡發；這一時期的《燕行錄》比其後若干世紀的筆談集都更加深刻，文筆也更好。大抵乾隆對錢謙益展開批判之前，朝鮮文士都對牧齋大為仰慕。嚴志雄教授在會中也提出有意將明末至清末所有朝鮮使臣關於錢謙益的材料，整理集中出來，其中當有許多尚待發掘與開展的學術議題。

第二位發表者為大木康教授。大木康教授指出，十五至十七世紀，是世界範圍內的大航海時代，也正是中國、朝鮮、日本三國彼此互動頻繁的時代。冒襄《影梅庵憶語》中的一條資料，曾提及以西洋衣料為董小宛製作衣服，而馮夢龍的《雙龍記》中有一段倭寇將軍說倭語的情節——難道馮夢龍學習過倭語嗎？明末清初出現不少與日本相關的書籍，例如《日本考》，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知和想象。而現在看來，似乎四百年來，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前後變化並不大。馮夢龍的《三言》對了解晚明江南文人對異國的認知，可謂絕佳史料，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提及萬曆皇帝平定的三處寇亂，其中一個就是豐臣秀吉。《三言》是天啟年間的出版物，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前不久，主人公李甲正是作為時代背景裏的「納粟監生」進入京師，因而見到杜十娘。最後大木康教授列舉出《三言》中可見的異國，包括：（一）蒙古、滿洲、西域、西南地域，（二）日本，（三）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四）印度，（五）波斯等西亞國家。僅如《古今小說》（即「三言」之第一部《喻世明言》）第十八卷的〈楊八老越國奇逢〉，就涉及了域內的女

真、蒙古、渤海、洞蠻，和域外的日本，如此廣大地域的故事。

在會議討論時，本場主持人劉苑如教授提出：大木康教授的報告中，《三言》裏因為戰爭與貿易兩個原因，帶動了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流動。嚴志雄教授探討朝鮮文士筆下的錢謙益，亦是適當地將其置於東亞視野之下，可謂錢謙益經典化過程的一部分，這一過程也涉及當時的周邊國家。南九萬堪稱是錢氏的理想讀者。廖肇亨教授指出晚明復古派在朝鮮的接受也十分廣泛，過去，朝鮮詩人追隨復古派的傾向十分明顯，而錢謙益正是標舉反對復古派旗幟的旗手，錢謙益在朝鮮的接受史與詩學恐不能無涉，若從周邊文壇看明清文壇的改變，也很有意義。而日本方面，在十九世紀賴山陽的詩歌中，錢謙益已是投降派的負面形象了。另外物質文化在東亞也是大有發展的可能，如《天工開物》、《物理小識》等書，都是依靠和刻本回流才有足本或者善本，是否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夠重視物質文化，才將原書完好保存在日本？關於《三言》一書，好的版本都在日本，很早就被購買而流傳到日本，現在都已經太習以為常了，但中國為什麼沒有完整的版本流傳？除了歷史的偶然性之外，是否有特別的原因有以致之？值得深入思考。京都大學木津祐子教授補充說道：豐臣秀吉也曾學習過中文，他在扇子上題寫漢文詞彙，如「拿茶來」。晚明有關日本的著作很豐富，如侯繼高《日本風土記》記載了日本的山歌、和歌、民間故事，晚明中國人對日本的介紹和翻譯，有什麼意圖？即使遭受倭寇擾亂，當時人對日本仍感興趣此一現象，亦值得探究。

第二場

主持人：嚴志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戰爭之後：從晚明兩部小說談解冤釋結〉

2. 板倉聖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張璠圖的繪畫及其接受史——以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藏作品為中心〉

本場首位發表者為劉苑如教授。劉教授著重討論兩部晚明小說——孫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和方汝浩的《禪真逸史》。劉教授認為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週

年，所以這兩部小說中關於戰爭與「解冤釋結」的主題，特別具有現實意義。前者成書於萬曆年間，後者成書於天啟年間。《禪真逸史》於江戶時代中期傳入日本，值得我們注意，該書涉及佛教與道教「劫」的概念。劉教授在研究中利用臺灣資訊所與荷蘭萊頓大學研發的兩種數據庫，透過文本標示的功能，統計了兩部作品中「誰在喊冤」的文本內容，發現《于少保萃忠全傳》的主人公生前為民眾喊冤，死後才為自己喊冤。劉教授指出關於如何解冤，從六朝、隋唐、宋代，到明清時代，在脈絡上可見其變化。

第二位發表者為板倉聖哲教授。板倉教授指出與董其昌並稱為晚明四大家的張瑞圖，其形象變化約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階段，因涉入魏忠賢逆案，清代人把他定位為罪人；第二階段，民間認為他是水星下凡而收藏他的作品；第三階段，透過黃檗宗東傳至日本，張瑞圖與黃檗宗的幾位僧人交往密切；第四階段，張瑞圖在古董熱潮中再度受到高度評價。江戶時代的古董商曾抽掉張瑞圖作品上的作者落款，冒充元代僧人的作品，以覬覦高價。張瑞圖的繪畫也成為日本畫壇的模仿對象，市面上的贗品很多。靜嘉堂藏有三幅張氏的畫作，都是張瑞圖退官歸鄉的作品。存世不少名家畫作都有張瑞圖的題跋與印章，尤其是吳派的作品，例如文嘉、戴進等人，即使題跋被後人割裂，也能考證出其與張氏彼此之間的關係。張氏的山水畫風格，是以元末四大家的造型為基礎來發展。在日本則有相當多的畫家，直至近代都模仿張氏的畫作。張瑞圖本人一方面受到五代、北宋山水畫風的影響，一方面也受到佛教繪畫的影響。最後，板倉教授強調，張瑞圖的形象應該要反省與突破過去強調政治影響限制的觀點，重新定位張瑞圖為明末文化交流風潮中表現突出的書畫家。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廖肇亨教授提問，黃檗宗的書法是否受到張瑞圖的影響？實際上萬福寺也藏有張氏的作品，例如對聯，這是一個絕佳的討論課題。此外，針對劉苑如教授的研究，廖教授指出，在西方文論中，罪惡感和西方文化中的現代性關係密切。現在談論懺悔，都以為是受到西方基督宗教的影響，其實絕非如此。冤的概念雖於佛教中流行，但佛教觀念中主要是因果報應，也就是報冤，而非解冤。公案小說從宋代到元代的流行，表明人際關係會越來越成為敘事作品喜歡表現的主題，因其具有更多的社會性。明代文人喜歡把這類問題提出來公眾化。這方面的議題，未來應可展開更多的研究。林桂如教授指出，關於《于少保萃忠全傳》六到十二回的情節內容的象徵性為何？因其與于謙的生命歷程極其相關，從結構來

說，為人民伸冤是于氏功績的一大部分，正是這部分，可以突顯于謙冤情之重。社會中的工商階層在那個時代，已越來越成為一個可以發聲的階級。劉瓊云教授亦針對劉苑如教授的文章提問，她認為兩部作品的時代性其實有所不同，劉教授將兩部作品並置的原因可做更清楚的解釋。此外，因為兩部作品出版都是來自杭州同一出版集團，劉苑如教授半年來閱讀了此一出版集團的十幾部小說作品，因此觀察的角度也可加入出版文化的面向。劉瓊云教授最後指出，清初是小說發展史的關鍵時期，某些作品消失，而某些話題被提出，尤其是「冤」的話題。這兩部作品，其實代表兩種不同的階級如何處理「冤」這個主題。嚴志雄教授最後針對板倉教授的研究指出，如何更好地解釋張瑞圖的第四階段，即為何他的作品在今日被古董界如此看重？這應是值得探究的文化議題。

第三場

主持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發表人：

1. 木津祐子（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論 題：〈17、18 世紀域外的「敘事」——以唐通事和荻生徂徠為例〉

2. 劉瓊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論 題：〈從異議者、術士到忠臣：明末清初小說戲曲中的「靖難」與程濟〉

本場第一位發表者為木津祐子教授。木津教授指出，在以中國為核心向周邊地區發散的漢字圈或漢文圈，由於「當地」與中國的距離，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訓讀，而在各種訓讀的現場，伴隨而來的還有被本土化的中文書面語「漢文」。木津教授從唐通事的擬作話本小說以及荻生徂徠的對古文辭的提倡，來討論兩種不同的訓讀情況，探討如何汲取「敘事」此一要素，而「敘事」的重要性又是如何在其中體現。首先，長崎的唐通事，或者琉球的久米村通事，他們不僅是中介者，同時也是白話小說的模擬創作者。然而，長崎和琉球的擬作話本小說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反映出兩者對於中國的認識以及作者自身的相當不同的立場。在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中，徂徠將過去日本的訓讀轉化成新的形態，例如朱熹《大學章句》，他認為日本人若根據和訓來模擬漢文的話，可以說是假冒的漢文。如果只看訓讀文，藉助

符號閱讀原文，不太考慮原文的語序應該如何，這將會歪曲、誤解原本的中文，所以應按照唐話原本的語言去理解，故而提倡所謂的「崎陽之學」，也就是長崎的學問，從而成為中華人，但這種想法過於理想而未能實現。在長崎唐通事創作白話小說中，主要採擇身邊的歷史故事撰寫小說，目的多半是為了教化，或者為了翻譯的工具性而進行的創作。荻生徂徠主張默讀，提倡所謂讀書不如看書的觀點，根據吉川幸次郎的《徂徠學案》，秦漢古文辭是簡而文的，相對而言，宋代以來的語言是冗而俚，訓讀文像今言，所以是日本學者要改變學習的對象。

第二位發表者為劉瓊云教授。她指出，託名程濟的《從亡隨筆》是晚明建構出來的一部關於靖難的作品。靖難故事經歷整個明代，架構與內容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亦越來越精緻，《從亡隨筆》即為其中一部代表作品。劉教授指出，各個不同階層，從高官到中層士人再到底層民眾，其心目中的程濟形象並不相同。程濟的故事，首先見於史書，其後是《續英烈傳》，接著是陸人龍的《型世言》、周楫的《西湖二集》，再到黃道周、周亮輔的《廣百將傳》，從明代前期到明清之際，每部作品所側重的內涵皆有十分重要的變化。關於忠臣與正統，以及歷史的認知，若以程濟故事為核心的相關文本來展開探究，便能觀察到諸多演變的脈絡。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廖肇亨教授指出若把程濟擺在名將的序列來看，明顯是安置錯位，但關鍵不是錯位，而是為什麼錯。此外，當史料少的時候，不妨多談人物的塑造，但當史料豐富的時候，則應更多關注史實的重新發掘，比如目前發現大量姚廣孝的史料，這部分可以從護國佛教的角度重新梳理。朝鮮通信使曾經在江戶買到中國小說，例如《平山冷燕》之類的禁書，這與檯面上詩文的文戰有所差異，說明不同文體在當時國際交流當中的不同作用。李爽學教授針對木津教授的研究，特別提出在西班牙、法國的國家圖書館，看到利瑪竇練習語言的時候，亦寫成了似乎是白話小說的文本，這與日本唐通事的書寫行為很有相關性。因此可思考是否江戶時代也有來日的西方傳教士，有過類似的行為和文本創作，因為事實上，西方傳教士曾根據《聖諭十六條》有過類似的創作。另一方面，長崎唐通事則利用話本、章回小說的框架創作。此外，朝鮮通信使也曾利用了與之不同的小說文本資源，進行漢文再創作。嚴志雄教授指出，建文帝故事的情節越來越多，變化多端。另外，嚴教授提問《姜氏祕史》一書是否能定位為史書？還是已經接近史書的小說野史？以之作為建文帝、程濟史書中歷史形象的基準是否合適？而程濟之護主，與宋代的陸秀夫是否相同？嚴教授最後指出，即使是正史，也不過是一種歷史書寫，一種集

體記憶，所以其實程濟的所謂原型，不是工作的重點與起點。《姜氏祕史》這樣的記錄，只是一個起點，相對於後代的文本而言，它也是一種歷史重層疊加的情形，近於口述歷史，因此可以善加利用。

第四場

主持人：大木 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李爽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耶穌不滅孔子，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

2. 新居洋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

論 題：〈傳入歐洲的明清思想：以入華耶穌會士錢德明的報告為中心〉

本場第一位發表者為李爽學教授。李教授在開場時提到，此文亦是為紀念恩師余國藩教授而作，余教授今年甫去世。李教授提到：康熙年間馬若瑟來到中國，立志研究中國文學，他是第一個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的人士，其譯本影響了西方「孤兒」文學形象的傳統，並從法國傳播至英國、德國到意大利。此外，馬若瑟也翻譯了《詩經》，他有自己的一套翻譯思想，亦有以拉丁文撰寫的《漢語札記》，從一開始就學習中國的經典。《儒交信》寫的是中國儒士如何接受《宗徒信經》這部天主教典籍。當時羅馬教廷不許中國教會翻譯《聖經》，因此當時東亞國家如中國、日本的教會，只能翻譯一些經典的教條，例如《聖母經》、《宗徒信經》等。馬若瑟創造性地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將《宗徒信經》改寫為中篇小說，以利該書在中國流傳。李教授指出，天主教講天人之際以及生死之際，但儒家或儒教不太講這些問題。在《儒交信》這部作品中，虛構的儒士李光與司馬溫古辯論，從而領受了天主教的信仰，而馬若瑟的自號就是「溫古子」。最後，一九四二年出現了該書的鉛字印本，故其版本不只有抄本。

第二位發表者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新居洋子博士。新居博士指出：從大航海時代的十五世紀開始，至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東亞成為世界貿易網路的中心之一，澳門和長崎是其中的據點，有各種商品和人物的流動。十六世紀末，東西方思

想開始相互流動，中國學問真正開始向西傳布。十七世紀葡萄牙勢力衰弱，新興的荷蘭、英國、法國開始取而代之，保護耶穌會士前往東亞傳教，他們將大量中國的信息、知識輸入歐洲，例如儒家思想、政治體制等，對西方的啟蒙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法國的錢德明便是其中最後一代的代表人物，錢德明於一七五〇年入華，在北京去世，任職於中國宮廷，在內閣蒙古堂翻譯俄羅斯文、拉丁文，是法國政府最重要的通訊員。新居教授進一步說明：錢德明引用的文獻多為漢文、滿文，最頻繁討論的問題涉及三個方面，即中國歷史、《孔子傳》和陰陽理氣論。錢德明之前的耶穌會士也曾寫過許多中國報告，他們主要參考《資治通鑒》、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劉恕《資治通鑒外紀》、金履祥《資治通鑒前編》，即明代《綱鑒》類書等各種漢文文獻。錢德明則有所不同，一七六九年完成了《中國帝國普遍史紀年摘要》，談到《七十子譯本聖經》與中國上古史的相同點。而且他主要參考滿文文獻及清朝欽定的《歷代三元甲子編年》，並批判了前代耶穌會士參考的文獻非「真正的」資料，也就是不可靠的文本，比如《綱鑒》等通俗文本，以及「註釋」等越出「正文」的文本。所謂正文，指的是《書經》、《通鑒》的正文等，這些都反映了乾隆朝的滿文文化認同運動。錢德明的《孔子傳》主要參考了明清書籍，也反映了明清孔子的神聖化傾向。朱子的《四書》新註是明清中國儒學的正宗，耶穌會士面臨明清時代宋明理學理氣論與耶穌思想調適的難題，故著重參考《性理大全》。錢德明還撰寫了《中國古今音樂論》，引用了大量朱載堉的著作。最後，錢德明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擇文傾向、他與明清中國思潮間的關係，以及明清中國學術思想西漸的歷程。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木津祐子教授提出，若觀察馬若瑟的文本，既有白話，也有文言的成分，兩者混融的趨勢十分明顯，為什麼使用這樣的語言？實際上《儒交信》所用的白話文是非常道地的當時白話，受到《西遊記》、《水滸傳》和馮夢龍的文本影響，所以很像明代的白話章回體小說。傳教士翻譯《聖經》，主要考慮的是語言風格，不能使用《聖諭廣訓》這樣俚俗的語言或是普通的章回小說，也不能用《金瓶梅》這樣使用太多方言的文本，所以最終選用的是《三國演義》，因其介於白話和文言兩者之間。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生王雯璐提問時指出：韓國有漢文書寫的傳教士小說被譯成韓文的情況。耶穌會士的漢文小說，在中國讀者的接受這個問題上，有沒有研究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傳教士漢文小說對於近代小說研究的意義越來越受到重視。今年六月，在復旦大學將召開一個

有關近代傳教士漢文小說的會議，王德威教授正在寫近代漢文小說的新史，也納入了傳教士的作品。《儒交信》因為有若干抄本，而且有排印本，所以影響力不會太小。郭時獵的小說，有時候就是照抄馬若瑟。北京中華書局剛剛出版了一部新的天主教漢文作品整理本，一百五十萬字，可以看出清代北京中下層教民的語言狀況。

第五場

主持人：塚本麿充（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林桂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明末女教書之出版與貝原益軒〉

2.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論 題：〈明清之際東渡日本僧人獨立性易研究序說〉

本場首位發表者為林桂如教授。林教授指出明末和江戶時代的女子教育書籍的出版，藉著觀察其書肆和相關的書籍版式，可以討論當時女子教養的庶民化。日本的貝原益軒，著有《和漢童子訓》，其中引用了諸多中國女教書的內容，影響了其後和文書《女大學》的創立。而萬曆時期黃魯曾的《古列女傳》是胡文煥錢塘文會堂刊版的底本，胡本又成為和刻本的底本。一六五三年的和刻本存世最多，刊刻的書肆集中於京都，少量在大阪，胡文煥的杭刻本今天已經亡佚，今人唯有通過和刻本了解胡刻《列女傳》的面目。此外，雖然《列女傳》的明代版本極多，但和刻《列女傳》只選胡刻為底本。其他女教書尚有《女四字經》、《女小學》、《大明仁孝皇后內訓》、《女範》。《內訓》主要以貴族女子為教養對象。《女範》則引述了諸多古代經典有關女訓的內容。貝原益軒是江戶有名的儒者，《和漢童子訓》中提到女子七歲之前一定要學習漢字。《女大學》是圖文並茂的所謂「圖書」，畫了養蠶、教育小孩的各種內容，出版地則在大阪。《女大學》的內容出自《和漢童子訓》，但增加了服從夫君的內容，強調對於夫家父母的孝順要更重於女子本家，並帶有中國、日本相關女訓內容集成的性質。藉由上述女教書之刊行與東傳的分析研究，對於漢籍在東亞文化建構中的地位希冀能有進一步之認識。

第二位發表者為廖肇亨教授。廖教授指出獨立性易是著名的書法家，臺大日文

系徐興慶教授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集。關於明清時期臨濟宗在東亞的傳衍流布，主要代表人物為十七世紀越南的拙拙和尚和日本的隱元隆琦。相對而言，明清之際曹洞宗壽昌派的海外流傳論者寥寥可數，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的石濂大汕和日本的東皋心越，東皋心越則是江戶琴學之祖。宇治黃檗山萬福寺由隱元隆琦開山，一說張振甫即是「崇禎三太子」；還有陳元贊號稱柔道之祖，朱舜水是水戶學之祖。作為文化群體的渡日華人，則應把黃檗僧侶和當時的檀越結合起來探究，如黃檗山范道生的雕刻，又如黃檗版一切經的出版等，皆是當時僧俗協同互動的結晶。獨立性易在十七世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獨立本名戴笠，杭州人，明清交替之際逃亡日本，入隱元隆琦門下，以醫術聞名，據說將人痘術傳入江戶，詩書畫無不精通。獨立性易與黃檗宗僧團的關係略呈緊張，雖然修禪，但詩風激越。其異文化生活的體驗很多，例如描寫看到更加紅艷的櫻花，與當代櫻花的色彩感不太相同。此外，獨立性易亦寫富士山，描述得類似泰山，並使用諸多終南山的典故，尤其帶有自身獨立人格的意味。他也看西湖，因為自身是杭州人，所以用西湖寄託鄉思。藉由對獨立性易詩文及思想特質的闡發，能進一步挖掘其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意義。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間，塚本鷹充教授指出：林桂如教授的研究，有助當代日本人了解今日日本女性道德建構的來源。而獨立性易的書法與帶有閩習（即福建地區的特殊風格）的黃檗宗風格大異其趣，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劉苑如教授在提問中指出女教書當然不始於明代，但晚明確實是此類書籍發達起來的時代，女教書也屬於類書的範疇。胡文煥本身就是杭州最有名的藏書家，所以會成為日本人接受的首選。女教書除了道德教訓的一面，其中也有醫療或者化妝等內容，相信將來林桂如教授也會進一步涉及討論。木津祐子教授認為獨立性易（杭州）、朱舜水（餘姚）是浙江人，隱元隆琦是福建人，應該都帶有自己的家鄉概念。此外，唐通事也很有地域性，而黃檗宗的僧團主要是福州人，所以獨立受到排擠也和福建人對於浙江人的排斥有關。江戶時代每個人都需要屬於一個佛教宗派，因此唐通事很需要中國僧團來到日本，以便有所歸依，這與江戶時代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當時中國僑民的心態都有關係。嚴志雄教授認為廖肇亨教授的研究十分具有啟發性，他原來並不知道獨立性易是這樣的遺民詩僧，他以為獨立性易的詩歌讀來相對淺白，少用典故，確實很像禪宗的本色詩歌，是放開手腳寫作的。劉瓊云教授提到明末女教書傳到日本，實際上這類書的傳播還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貝原益軒雖然推動此類書籍

時日較遲，但影響力卻不容小覷。在他之前還有《假名列女傳》這樣的《列女傳》翻譯書，此後才出現相對獨立的日本女教書，如《本朝列女傳》（漢文）、《本朝女鑒》（和文）模仿中國書，但換成日本的傳說故事。

總結討論

在總結討論時間，大木康教授首先解說本次會議名稱由來，本次會議與會的學者們都是中國問題的專家，但為了申請經費與通過東大專團的審查，其中包括理工科的教授，為了讓他們易於理解會議主旨，所以在本次會議的主標題特別加入了「中國」二字。

廖肇亨教授認為本次會議之所以圓滿成功，最大功臣是大木康教授，在此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對大木康教授與東洋文化研究所表示感謝。廖教授提議，也許每兩年文哲所都可以和東文研合作辦一次會議，讓這樣的會議未來制度化。最後，廖教授認為以往中國學的研究，在方法與問題意識都受到美國學界的影響，但將來應該更多引入日本學術傳統的影響，像內藤湖南、西嶋定生等大學者都提出從亞洲出發思考亞洲的方法觀，所以應該在此基礎上反省中國學的方法論。總之，要尋求新的研究範式，也要建立在豐富、堅實的文獻基礎上面。

李爽學教授認為歐洲文學在明清之際進入中國社會，許多歐洲著作都是先翻譯成日文，中國則往往稍微晚一些，例如《伊索寓言》的翻譯，古代日本和中國採用的翻譯策略是非常不同的。另外，像《聖若撒法始末》這樣的作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國於一六〇二年翻譯成中文，但一五九〇年代首先是譯成了日文。江戶時代初期，日本接受了不少西方傳教士的學問，例如當時的儒者平田篤胤等等，所以東亞的天主教文學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把中、日、韓、越四國的文獻線索勾連起來，這種傳播流程非常有趣。本次會議的主題即世界中的明末清初，這樣的視野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將東亞漢文化圈作為整體看待，尤其由東亞知識人自己來做研究的話，應該比西方人更有優勢。

嚴志雄教授則以東亞地域不同的文化比喻，這可以類比東亞的相似文化，司徒琳教授曾主持「世界史中的時間」，試圖脫離國族的約束，而是從文化本位的角度談中國學。例如出版文化的範式，過去過度受到西方討論視角的影響，但像中國書物這樣的文化傳統，應該可以用更加東方的視角談論，可能會更有意義。

劉苑如教授認為這次會議她受到很多的啟發，尤其是自身作為一個研究六朝方面的專家而言；劉瓊云教授則主張當位置移動時，會有不同的感受，例如對於中國學問的研究，空間移動便會有很多不同的心得。她希望將來這個平臺能制度化，大家定期地聚在一起討論與交換研究心得。木津祐子教授則指出當初也曾經有過類似研究計畫或者意向，但平時忙於冗雜的工作，這次參與會議感受到非常好的研究氣氛。

最後，大木康教授認為東文研的前任所長是羽田正教授，是西亞的專家，現在他也開始提倡世界史的研究視野。明末清初與此前的唐宋相形之下，地域之間的交流更為密切，甚至具有全球化的性質。這也是這次會議舉辦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這個會議是文哲所古典文學三年計畫中所策劃的活動中的一環，同時也是與國際學界接軌對話的重要契機，此次會議相關論著即將作為研究成果出版。



與會學者合影

後排左起：林桂如、新居洋子、大木康、劉瓊云、板倉聖哲、塚本麿充
前排左起：木津祐子、劉苑如、高見澤磨、廖肇亨、嚴志雄



分場發表

左起：大木 康、李爽學、新居洋子



會場一隅



京都大學木津祐子教授提問



中國文哲研究所劉苑如教授發表